

史论杂稿

SHILUN ZAGAO • 李鸿宾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史论杂稿

李鸿宾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论杂稿/李鸿宾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1108-687-4

I. 史… II. 李… III. 史学—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4472 号

史论杂稿

著 者 李鸿宾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骏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3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87-4

定 价 38.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这部集子的缘起，应当说是我承担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过程中一个新的想法，或者说是附带性的科研成果。

根据我所服务的中央民族大学公布的教育部下发的文件精神，我于2004年下半年提出申请，2005年上半年承蒙不弃得到批准，于是就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课题一步一步地实现。我当初拟订的课题大致有两个：一是“唐朝对河北边地的经营与蕃族的互动”，二是“唐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问题”；成果的形式也分成两种类型，即论文和论文集。先是一篇一篇地完成论文，适当的时候再将有关的论文结成集子。我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感觉到每篇论文都应当有新意，再将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专题式的文集，学术质量可能会好一些。因为过去老一代史学家大多采用这种形式，他们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单篇的论文里，所以我总有一个想法：论文因为篇幅较小，不容易说套话，新意应当比著作更多。著作固然也是很好的写作方式，但需要长期研磨，方可有较高的学术质量，短期之内出来的成果，我直观感觉，学术含量是要打一定折扣的。所以自己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要想出版高质量的专著，难度比较大，而论文和论文集，在给定的时间内，学术性效果要比专著似乎强一些。

当然，我接触到的学术界，包括学校里，目前似乎有种意向，就是专著比论文集要好，甚至评奖之类的也注重专著，而将文集排除在外，除非你是国内外响当当的学家名流，另当别论。但考虑到史学老辈学者一生心血的结集，以文集或论文集为形式的出

版者不在少数（甚至是大部分），我内心就始终有种认同感。所以考虑前考虑后，自己承担的课题，还是选择了论文和论文集的形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拟订的第一个课题，最终是以《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为名，于2008年3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一个题目，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也是采取先发表单篇论文、再结集出版的方式，具体情形，我会在那部集子里有详细的说明。

正是在运作这两个课题的过程中，我又产生了对以往和目前所进行的其他论文和文章结集出版的想法。这些文章有的与课题本身有直接关系，因种种原因不便收入到上述两个集子里的，有的则是本项目以前写就的，还有的是针对自己教学和科研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探索、表达某种想法和观点的，等等，这些也都属于自己从事本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打算将它们收罗起来，以《史论杂稿》为名，作为这个项目的附带成果。这就是本集子出炉的前后背景。

这部集子由6个部分组成。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性质不一，有些是专题论文，有些则是一般性介绍，还有书评、会议综述、回忆性文字和教学体会等，因而在行文风格、技术编排、文中注释等各方面也颇不一致。这次将各文搜集在一起，对文章内容不做改动，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对文章中的注释和格式做了部分修正，凡是与本书规定的体例不合的地方，均做改正，以求全书的统一。关于内容编排，我曾征求本学院钟焯、崔岷二位青年教师的意见，并做了适当的调整，以使编排更为合适一些。现将编排的具体设想简述如下：

第一编“唐史与中古史论述”中包括《从历史角度看生态环境与开发的对应关系——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某种线索为例》、《〈徙戎论〉的命运与天下一家的格局》、《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融合分解之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水部式〉与唐朝的水利管

理》、《论裴度》、《谋士敬翔》、《郭崇韬其人其事》和《我对“金界壕”与“长城”概念的理解》等8篇文章，大体上以朝代先后为序，几个人物尽可能集中排列。

第二编“其他史学论述”中由《一代宗师陈寅恪——陈寅恪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学术大师悬想》、《民族史研究若干问题蠡测》、《历史工程与艺术审美》、《邓小平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传统与近代的对接——从地域和民族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王朝的近代境遇》、《臣民与民族、王朝与国家——古今转变的范式问题》等8篇文章构成，编排的程序依次为人物、一般性史学论述，最后几篇涉及古代向近代的转换问题。

第三编“史著评论”有《通鉴学》、《西域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中西学术之间：荣新江教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高宗其人之真相——孟宪实教授〈唐高宗系列讲座〉之评论》、《李志贤先生〈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书后》、《对王震邦教授〈陈寅恪论学的四个面向〉博士论文的阅后意见》、《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读后感》和《一部值得中外读者阅读的长城书品——评介〈话说长城：英汉对照〉》等8文，排列基本先唐史，后其他；唐史内则依据书评内容和发表先后排列。

第四编“学术综述”中只有《一九八三年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概况》和《长城学研究的一次盛会——首届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2文，以发表先后为序。

第五编“其他文论”中包含《关于长城保护与发展的几点看法》、《关于〈长城保护条例〉的解读》、《我对长城入选‘新世界七大奇迹’的想法》、《潘光旦先生与他的学术研究——纪念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传统与现代之间——西部开发引生的少数民族现代化问题》、《我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理解》、《期望中的国家民族博物馆》和《我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点滴记忆》等8文，

先长城方面的文论，后其他，以内容编排。

第六编“教学文论”由《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几点看法——以康奈尔大学为例》、《有关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的若干想法——以历史系为例》、《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质量的评估——一个教师的感受和臆测》、《我对“中国古代史”教学中“人文”概念的理解》和《师生问答录》等5篇文章组成，基本以发表的先后为序。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集子里的文章，有些是我用电脑之前手写的，这次一并用电脑录入，我就请我的研究生袁本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2007级博士生）、丁平平、乔玲（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2006级硕士生）、孟乐、翦研（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2007级硕士生）等同学分别负责，将手写稿全部打印出来，大大加快了集子的编辑速度。嗣后，我又对全书所收各篇再仔细校对、修改，基本成型，就是读者见到的这个样子。另外，书稿成形之后，我又请在出版社工作的郎洁同学帮我校对一遍。这里，对学生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承蒙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民族大学是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工作、服务和生活的地方，作为学校的一名教师，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学校的出版社出版，也是我向往并感到荣幸的。国外学者能够在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是作者荣耀的事情，因为大学本是教学和研究机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都集中在学术作品上，这是他们的传统。中国目前的出版社分布较广，而大学出版社的定位亦多以教学、科研为主，我校出版社也同样如此，选择它出版著作，自然是最理想的安排，而自己以前也蒙幸在本校出版社出书，这次又是如此，自己感到十分的高兴。这里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鸿宾 谨识

2009年3月10日

目 录

第一编 唐史与中古史论述	(1)
从历史角度看生态环境与开发的对应关系	
——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某种线索为例	(2)
《徙戎论》的命运与天下一家的格局	(12)
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融合分解之关系	
——以北方区域为线索	(20)
《水部式》与唐朝的水利管理	(48)
论裴度	(54)
谋士敬翔	(63)
郭崇韬其人其事	(69)
我对“金界壕”与“长城”概念的理解	(77)
第二编 其他史学论述	(93)
一代宗师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94)
学术大师悬想	(117)
民族史研究若干问题蠡测	(126)
历史工程与艺术审美	(133)
邓小平理论与史学研究	(141)
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	(148)
传统与近代的对接	
——从地域和民族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王朝的近代	
境遇	(161)
臣民与民族、王朝与国家	

——古今转变的范式问题	(174)
第三编 史著评论	(189)
通鉴学	(190)
西域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235)
中西学术之间：荣新江新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240)
高宗其人之真相	
——孟宪实教授《唐高宗系列讲座》之评论	(246)
李志贤先生《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书后	(253)
对王震邦教授《陈寅恪论学的四个面向》博士论文的 阅后意见	(262)
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读后感	(271)
一部值得中外读者阅读的长城书品	
——评介《话说长城：英汉对照》	(277)
第四编 学术综述	(281)
一九八三年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概况	(282)
长城学研究的一次盛会	
——首届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303)
第五编 其他文论	(313)
关于长城保护与发展的几点看法	(314)
关于《长城保护条例》的解读	(329)
我对长城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的想法	(337)
潘光旦先生与他的学术研究	
——纪念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	(342)
传统与现代之间	
——西部开发引生的少数民族现代化问题	(349)
我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理解	(362)
期望中的国家民族博物馆	(375)
我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点滴记忆	(381)

第六编 教学文论	(391)
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几点看法	
——以康奈尔大学为例	(392)
有关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的若干想法	
——以历史系为例	(405)
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质量的评估	
——一个教师的感受和臆测	(419)
我对“中国古代史”教学中“人文”概念的理解	(431)
师生问答录	(441)

第一编
唐史与中古史论述

从历史角度看生态环境与 开发的对应关系

——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某种线索为例

一、环保问题的提出

中国从政府角度重视环境保护大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事。前几年曾经任职国家环保部门的负责人回忆说，那时的环保还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课题予以批判，人们是不敢随便提及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对环保的认识是相当晚近的事实^①。

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对环保有清醒和系统的认识呢？就个人而言，我们无从具体论证，你可以追溯到老子、庄子甚至更遥远的时代，但是具有像今天这样比较严格意义的环保概念，我认为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还没有遭受今天这样的环境破坏问题。中国社会对环境的认识，作为有组织、有意识并以集体力量回应的，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时候。与西方相比，我们要落后得多。仔细追究起来，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经过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情况下才开始考虑这一问题的。中国在工业化之前，人们不可能认识所谓的“环保问题”。那么，在古代社会，有没有这类问题呢？答案可能是这样的：不存在工业污染的环境破坏；但却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

^① 我是在电视上一个访谈的节目里看到的，因时间久远，具体的年月和栏目细节已记不清楚了。

二、环境开发的形式与时间

古代社会环境破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农业耕作地区的扩大，特别是对非农业地区的浸染。在中国，主要表现在农耕地区对游牧地区的浸透，通常的手法是在邻接农业地区的草原进行耕作，将草地变成耕地。历史上，这种情况从西汉中期开始，以后持续不断。开发的形式一是组织军队开荒，二是招募百姓开垦，目的是在边区形成稳固的保护防线，让戍边的人员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直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疆北部的生产建设和黑龙江北大荒的开垦，都可以与历史上的同类事件相提并论。

三、开发的原因

开荒和耕地的扩大，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原因。简单说，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农耕地区为保护自己，就要组织军队进行防守，而军队的粮草供应直接影响防守的稳固。一般说，粮草由内地供应，交通是个大问题，比如秦始皇曾派军队北上进攻匈奴，辟地千里，在河套地区以黄河为界，与匈奴对峙。为了保护边地，秦朝“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①。但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而言，从远方调剂粮草，成本过大。所以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等率领汉军夺得河南地（即河套地区）之后，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构筑朔方城，随即迁徙10万口民众充实其地^②。7年之后，山东水灾，百姓饥乏，汉朝又

^① 见《资治通鉴》卷18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0页。

^② 见《资治通鉴》卷18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正月、三月条，第604—605页。

将贫民迁往关西和朔方达 70 余万口^①。这前后 80 余万口都是内地的农民，他们到那些地区当然是开荒种地了。《资治通鉴》说：“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②这田官就是负责农业生产的官吏。《汉书》卷 24 下《食货志下》中所谓“朔方亦穿溉渠”，讲的都是有关开荒种粮的事情。用兵匈奴开拓边地，除了调剂粮草用于支持军队之外，征调民力到边地开发种粮，就成为支撑军队戍边的手段，就地开荒因此成为首选的措施。而边防之地基本上处在游牧或半游牧地带，开荒首先在这里进行。越是强盛的王朝，这种行为就越加突出。比如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弊，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③。这种情形又超出了汉朝。继其之后的唐朝，中原的防守范围扩大到长城甚至以北地区，他们要防备游牧势力的南下，都在这些地区派驻军队，修建防御工事，如唐中宗时期张仁愿在河套黄河北岸修筑三座受降城，外围又设置东西 1800 里的烽火线，派驻军队进行防守^④。出于生活的需要，开荒种地和经商坐贾就成为生存的方式了。到后来，长城沿线地区的农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多。

第二，在中国历史上，农耕地区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增加的结果。伴随着人口增加的则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繁殖人口、扩大耕地是王朝强盛的象征，也是古人最具有活力、成为主流的话语。例如西汉强盛时期的武帝调动大军进攻匈奴，一改汉朝的委曲求全的姿态，夺取河套战略要地，设置朔方郡，迁徙汉人数十万口充实朔方等地，那里的农业人口随之大增。不久后，汉军又

① 见《汉书》卷 24 下《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62 页。

② 见《资治通鉴》卷 19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夏月条，第 645 页。

③ 见《通典》卷 2《食货二·屯田》，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44 页。

④ 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5—80 页。

攻占河西走廊，设置酒泉、武威等郡，“徙民以充实之”，“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①。汉朝的目的是削弱匈奴，采取的办法是设立郡县，徙民充边，这些充边的人大都要开荒种田。上文曾列举《资治通鉴》朔方至令居的田官设置，到后来，“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②。关于河西走廊的徙民与种田，桑弘羊等人的奏疏中说得很明白：

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③

汉朝以后的唐朝，是另一个强盛的王朝，它开边拓土的幅度远大于汉朝。唐太宗和高宗时期，相继征服了东西突厥，特别是东突厥的降服，使唐朝边地向北大大地推进了。作为农耕和游牧民族共同尊奉的皇帝、天可汗，唐朝开创了我国历史和疆土的新天地。唐朝疆土开辟的途径大体上也是以耕地开垦为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周边游牧势力的汉化，二是缘边地区营田机构的确立和职务的设置。

所谓游牧势力的汉化，其生活方式的农业化是重要的特征。而这些势力之汉化的前提就是他们归顺王朝。根据岑仲勉先生对中唐以前的统计，西起甘、凉，东迄幽、燕，外族融合于汉族者有数十万之多^④；而吴松弟先生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仅唐初贞观年间北部突厥、铁勒、粟特等民族内迁的就多达百万；高宗武则天时期周边移民也同样多达百万，占北方人口的五六分至七八分之一^⑤。

① 见《资治通鉴》卷20 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末条，第658页。

② 见《资治通鉴》卷21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春月条，第707—708页。

③ 见《资治通鉴》卷22 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六月条，第738—739页。

④ 见岑仲勉：《隋唐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8页。

⑤ 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隋唐五代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8—140页。

他们内迁的方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的保持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如贞观四年（630）唐朝平定东突厥之后朝廷就如何安置他们进行讨论，太宗最后采纳了大臣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户安置在长城沿线地区，以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性^①。但是随着内迁之后他们与汉人长期的交往和联系，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变就不可避免。例如居住在河套的六州胡人，他们是在东突厥降服唐朝的同时归顺朝廷的，原来不属于农业生产的民族，但自从定居之后，农业的比重就开始增加，有如“兰池胡久从编附，皆是淳柔百姓，乃同华夏四人（民）”一般^②。玄宗开元九年（721），六胡州发生康待宾等人的叛乱，旋被平定，唐将六州胡人迁往内地，但他们后来还是回到了六州故地，玄宗下令宰相牛仙客“于盐夏等州界内，选土地良沃之处，都置一州，量户多少置县”^③。六胡州从设置到后来的变迁，其趋势是这里的人户逐渐转向农业生活，上文中“选土地良沃之处”就是农业生活典型的写照。

值得指出的是，《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所谓“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这说明，唐朝在边疆地区开垦土地、种植庄稼以供军队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且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同书同卷说：“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十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殖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④可见，边疆地区土地开垦已成为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官员进行管理的事务，垦殖的多少和

① 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第16—17页。

② 见《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584页。

③ 见《唐大诏令集》卷128《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人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633页。

④ 见《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3、1372页。

好坏则成为官吏是否尽职的考核标准。

上述事例告诉我们，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农耕生活的扩展，即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农业民族的扩大；其次是农业民族扩大并融合的基本对象是游牧势力，融合的趋势是使游牧民族农业化^①，当然是在儒家化的覆盖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农业化的增长是在侵吞游牧草场的过程中实现的。而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口数量的增长。我们看到，凡是朝代强盛或兴旺发达的时候，都是人口增加的时期，原来的土地不敷需求，就开垦荒原野岭，到明清时期，凡能开垦的地区都已开垦完毕，于是目标就瞄准向了边疆^②。这些都是在维护政权和王朝的名义下实现的。易言之，对游牧地区的开垦是为了维护王朝的利益。

第三，20世纪50年代新疆建设兵团的开发和北大荒的开垦，前者是出于稳固边疆领土和国家的角度着眼；后者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锻炼的产物，其主旨是让青壮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背后隐藏的经济因素则是城市人口暴涨，容纳有限，只好将部分人口转移到农村去，北大荒等地正是人迹罕至之处，将人口疏散到那里，可以缓解这种压力。

四、隐藏在某种观念之下

所以，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即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特点，基本呈现这样的趋势：首

① 以奚人为例，在《旧唐书》卷199下《北狄·奚国传》里，他们的风俗被描写成“并与突厥，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到《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奚传》里其王去诸所在的部落就“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稔，秋熟则来获”了。这说明奚人中至少有部分开始从事农业耕作的事实。

② 以北京地区为例，在唐朝时期幽州是农牧的分界线，此地北部属半牧地区（参见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到了明朝，通过军屯和民屯等方式耕作，军队和山东、山西等地的外来者开始落居在半山区和山区，逐渐形成以营、屯为名称的村庄（参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7—358页）。